

超时劳动对青年婚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肖 涵 葛 伟

摘要: 在经济社会发展早期,增加工作时间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随着超时劳动的进一步扩散,其对婚姻和生育的负面影响也有所显现,单身和独居青年逐年增加即是重要表现之一。利用Probit模型分析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发现超时劳动能显著降低青年劳动者结婚和生育行为的发生率,但随着工作时长逐渐增加,其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负向边际作用越来越小;超时劳动能通过工资收入和幸福感两种机制综合降低青年劳动者结婚行为的发生率,通过工资收入、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三种机制综合降低青年劳动者生育行为的发生率;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对数字技术依赖强、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的农村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负向影响相对更大。因而,要改善超时劳动与收入倒挂关系,兼顾工作弹性与安全双重目标,规范新兴领域和脆弱群体的劳动治理,进而建构友好型职业环境和共享型劳动体制。

关键词: 超时劳动; 婚育行为; 工资收入; 工作满意度; 幸福感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3.009

少子化问题关系着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局,人口均衡发展对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意义。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启了不断包容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新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①。但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仅是“全面两孩”政策后出生人口峰值^②的53.42%。在出生人口规模缩减的过程中,作为婚育行为的主体,青年劳动者的婚育行为出现了很多不同于其他世代的特有景观,例如初婚初育年龄延迟、婚育意愿走低、女性婚育比例下降、独居的“空巢青年”增多等。其中,除传统研究重点关注的生育成本、收入和代际支持等因素之外,超时劳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由于早期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经济社会发展对增加工作时间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有较大路径依赖,尤其是在东亚文化圈内,超时劳动曾一度被建构为积极的企业文化。但随着超时劳动的进一步扩散,其对工作与家庭平衡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加之传统的性别分工规范,母亲极易因此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性别收入差距也由此成为普遍存在的职场现象^③。最终,超时劳动导致青年群体尤其是青年女性不得不在工作与生育间作出选择。

现有有关劳动者婚育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性别平等^④、生育政策^⑤等结构性因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公共服务赋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影响机理及优化策略研究”(22CZZ025)。

作者简介: 肖涵,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兰州 730000; xiaohan7343@163.com);葛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兰州 730000; gw2010_11@126.com)。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9页。

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面两孩”政策后的出生人口数量峰值出现在2016年,为1786万人。

③ 克劳迪娅·戈丁:《事业还是家庭? 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颜进宇、颜超凡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2—10页。

④ 蒲新微、姚明霄:《女性性别平等观念对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人口学刊》2023年第6期。

⑤ 张洋、姜春云、胡波:《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国际实践及其微观生育效应——基于国际文献的元分析发现》,《中国人口科学》2024年第5期。

素,或收入^①、祖辈支持^②等个体和家庭因素,而由于超时劳动长期被企业奉为一种正向文化,鲜有文献分析超时劳动对青年婚育行为的影响。少量关注个体生育意愿等主观感受的研究认为,15岁至64岁职业人群的加班不会使初婚年龄推迟,亦不会降低劳动者生育二孩的意愿,并没有对社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③。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年轻人群体中的确存在因超时劳动而不婚不育的现象。同时,超时劳动带来的晋升机会和财富希望的累积,会放大生育意愿的乐观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青年人进入婚姻和生儿育女的可能性,但意愿不一定可以转换为行为。可见,超时劳动与青年婚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现有研究仅部分佐证了二者的因果关系,其间的影响机制尚未获得证实。

中国正大力推进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集聚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高层次创新劳动,而非简单重复高强度的超时劳动,故内卷化下的超时劳动更难提高工资收入和推动职业晋升,其负向影响在当前强调高质量就业环境下将被放大。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研究问题、研究对象、实证设计,以增强研究结果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价值。创新点在于:(1)重点关注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对完善中国人口政策更具现实借鉴意义。一方面,青年劳动者是超时劳动和婚育行为的主体,具有较强的生育能力和生育需求。另一方面,中国青年群体普遍存在生育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现象,相较于受主观情绪影响的理想子女数量,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更为实际和直接。(2)深入探讨和检验婚育行为中的工资收入、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机制效应。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年轻人越来越重视精神层面的需求,追求工作对自身发展和个人价值的促进作用,获取在工作中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些良性心理。同时,在社会竞争愈加激烈、不确定性提升的环境下,幸福感的价值不断凸显。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超时劳动对婚育行为的影响

超时劳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见现象,并对家庭生活产生了双向影响。早期一些研究认为,超时劳动具有积极效应或者并无直接的负面效应。对社会及其组织的整体发展和效益而言,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的不足导致了加班,且加班费用可以有效提升生产效率^④;对个体与家庭而言,无论是从客观资源还是从心理资本出发,工作-家庭丰富理论都认可超时劳动的正面效应,例如在工作或超时工作中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关系资源和物质财富将提升家庭等组织效能^⑤,而个体化工作或超时劳动中获取的良性体验也有助于增加在家庭领域的角色效益^⑥,缓解家庭角色的负面情绪,提高家庭个体解决问题的包容性和灵活性^⑦。

但也有大量研究分析了超时劳动的消极效应。日本经验研究证实了超时劳动是日本青年单身率

① 杨晓蕾、钟如雨:《家庭收入水平、性别观念与再生育意愿》,《财经科学》2023年第4期。

② 梁海艳:《地理通婚圈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生育决策机制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发展》2020年第4期。

③ 张婷皮美、石智雷:《“996”与低欲望社会:加班对结婚和生育影响的实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④ Hart R. A., Ma Y., “Wage-hours Contracts, Overtime Working and Premium Pay”, *Labour Economics*, 2010, 17(1), pp. 170-179.

⑤ Hobfoll S. 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y*, 1989, 44(3), pp. 513-524.

⑥ Sieber S. D., “Toward a Theory of Role Accumu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4, 39(4), pp. 567-578.

⑦ Kirchmeyer C., “Perceptions of Nonwork-to-work Spillover: Challenging the Common View of Conflict-ridden Domain Relationship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13(2), pp. 231-249.

高的主要原因,它不仅挤占了青年劳动者约会交友的时间,也使其更加沉迷于个人兴趣爱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与社会脱节的“宅文化”的兴起^①。而且有研究指出,超时劳动会显著提高员工离职倾向而不利于组织的稳定和发展^②。严重超时、高强度的加班也会对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严重的长期负面影响,而男女双方身心健康是婚育的前提:身体层面,加班使个体被迫选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而造成不利的健康后果,例如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口腔疾病等身体健康风险增加^③;心理层面,加班频率越低的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地位越高,对城市和政府的认同越高,促使人们更好地融入社会^④,而超时劳动长期累积的身心疲惫甚至会逐渐降低个体的社会包容度。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个体时间和精力有限性决定了超时劳动会挤压家庭生活时间,并由此产生家庭矛盾^⑤,降低个体婚育欲望,这一影响在女性群体中更明显。可见,加班对家庭生活的积极作用仅限于适度加班,毕竟个体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超时、高强度的加班会对个体健康产生长期负面影响,激化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

进一步来看,超时劳动对结婚行为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中国目前仍普遍存在先婚后育的行为秩序^⑥,超时劳动使婚姻行为的推迟或不婚现象的增加会直接反映到生育行为上,使得超时劳动对婚育行为的影响出现分层。其次,青年在生育行为中的决策变得更为理性,因而,随着社会对结婚离婚的包容性提升,超时劳动对生育行为影响更深入。再次,生育成本远超结婚成本,生育成本包括了较长时间内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也包括了物质和时间机会成本,尤其是对女性造成了明显的生育惩罚^⑦。相对更多集中于心理情感成本的结婚行为,超时劳动对生育行为影响更显著且敏锐。最后,考虑到中国正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重视劳动质量而非劳动强度,而且灵活就业更受年轻人青睐^⑧,消极效应更加凸显的超时劳动会加剧个体在生育与自我实现间的两难选择,即超时劳动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将更大。基于此,提出假设H1。

H1:超时劳动能够减少青年劳动者的婚育行为,且对青年劳动者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

(二)超时劳动对婚育行为的影响机制

超时劳动可通过以下途径影响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1)工资收入机制:超时劳动能够提高青年劳动者收入进而提高其婚育行为的发生率。超时劳动成为很多人工作和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个体希望通过加班增加工作机会、补充收入,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收入增加有助于解决工薪阶层面临的家庭问题,有助于其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收缩、个人购买能力下降会促使人们加班以增加收入^⑨。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工人往往将加班费视为赚取额外收入、养家糊口不可或缺的

① Yoshida A., “No Chance for Romance: Corporate Culture, Gendered Work, and Increased Singlehood in Japan”, *Contemporary Japan*, 2011, 2, pp. 213-234.

② Jiang S., Jiang C., Cheng Y., “Working Overtime in Social Work Settings: Associations with Burnout, 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Congruen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among Chinese Social Workers”,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Leadership & Governance*, 2023, 47(1), pp. 28-41.

③ Tanemura T., Zaito T., Oshiro A., et al., “Association of Overtime Work Duration with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Japanese Workers”, *Journal of Oral Science*, 2023, 65(1), pp. 44-47.

④ 秦昕、张翠莲、马力等:《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影响模型》,《管理世界》2011年第10期。

⑤ 吴愈晓、王鹏、黄超:《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⑥ 宋健、郑航:《非婚生育走向何处——比较视野下的婚育模式变迁》,《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⑦ 张娟:《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生育惩罚研究》,《人口学刊》2024年第4期。

⑧ 肖涵、胡龙彪:《灵活就业、社会资本与生育行为——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24年第4期。

⑨ Ozcan K., Birecikli Ş., Unlu M., et al.,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Overtime in the Turkish Private Sec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king Conditions*, 2021, (22), pp. 1-19.

机会,雇主也常常利用该需求要求工人增加劳动时间^①。在收入与婚育行为的关系方面,一般认为个人或家庭收入越高,其婚育欲望和行为越高^②。工作-家庭丰富理论也认为超时劳动能使家庭获得一些额外收入,可覆盖部分婚育成本,提高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基于此,提出假设H2。

H2:超时劳动能增加工资收入,进而提高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发生率。

(2)工作满意度机制:超时劳动通过降低青年劳动者工作满意度降低其婚育行为的发生率。首先,超时劳动会增加工作压力,影响工作效率进而降低工作满意度。加班实质上是企业通过日益精细化和量化的绩效指标增加劳动者工作压力^③,这将影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其次,超时劳动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工作满意度。超时劳动增加了员工因工作分配不均、任务优先级冲突等遭遇的人际关系建立、沟通协作困难^④。最后,长时间工作会导致员工精疲力竭,无法充分发挥才能和创造力,限制他们自主决策和行动的能力。有研究发现加班的过度鲶鱼效应并不利于员工工作控制,反而会造成其情绪耗竭^⑤,降低工作满意度。而工作满意度高的劳动者常常处于积极的情绪中^⑥,这会促使个体更好地履行家庭责任,更愿意体验同样可以带来满足感的家庭生活。个体的多重角色身份可以相互渗透和助益,工作满意度有助于实现对家庭关系的增益^⑦,丰富了人们婚育行为的物质、情绪和人际基础而有利于提升工作满意度的超时劳动则会负向影响青年婚育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H3。

H3:超时劳动能降低工作满意度,进而减少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发生率。

(3)居民幸福感机制:超时劳动降低居民幸福感进而降低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发生率。工作和休闲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幸福感,超时劳动与劳动者的幸福感呈负向线性关系。加班会增加个体疲劳度进而降低员工幸福感,即工作时间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导致女性为了保留已有的工作或实现升职加薪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通过超时劳动来累积人力资本,而生育是导致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⑧,故工作与生育的冲突显然不会增加居民幸福感。有研究发现,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解释力仅次于收入和健康,贡献率高于10%,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加显著^⑨。而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生育效应,可显著提高二孩生育意愿和转化行为^⑩。基于此,提出假设H4。

H4:超时劳动能减少幸福感,进而减少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发生率。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库,控制变量中的区

- ① Liu X. H., Wang Y., "Labor Exportation,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Exploitation Relationships—A Case Study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in Japan",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2, 8(2), pp. 210-242.
- ② 葛伟:《比较优势、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生育行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
- ③ 梁萌:《弹性工时制何以失效?——互联网企业工作压力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3期。
- ④ 邱化民、刘倩倩、石垠:《欠发达地区教师人际信任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教师教育研究》2023年第6期。
- ⑤ 龚朔、李海、夏铭等:《有人喊你加班吗?主动性和反应性工作连通行为及其对情绪耗竭的差异性影响》,《管理评论》2024年第2期。
- ⑥ 文吉、侯平平:《酒店一线员工情绪智力与工作满意度:基于组织支持感的两阶段调节作用》,《南开管理评论》2018年第1期。
- ⑦ 林忠、孟德芳、鞠蕾:《工作-家庭增益方格模型构建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4期。
- ⑧ 张樨樨、孙法芝:《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生育效应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 ⑨ 刘金典:《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劳动经济研究》2022年第6期。
- ⑩ 肖涵、葛伟:《公共服务质量对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经济科学》2022年第1期。

域变量数据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CFPS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综合性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通过对家庭和个体进行连续多年追踪,收集人口特征、收入与消费等微观面板数据。调查样本覆盖全国总人口的95%,涉及31个省(市、自治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考虑到中国于2013年年底开始逐渐调整生育政策,故选择2016年、2018年、2020年和2022年四期数据。中国法定劳动年龄指年满16周岁至退休年龄,世界卫生组织将44岁及以下个体视为青年,故将青年劳动者年龄限制在16岁至44岁。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3》数据显示,2022年45—49岁妇女生育率仅为0.66‰,约为40—44岁妇女生育率的1/9,因此以青年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可排除生理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再者,个体离婚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故将831个离婚样本剔除,还剔除了部分异常值与缺失值,共得到30262个有效样本。

(二)计量模型

由于婚育行为是二值型变量,而Probit模型中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契合大样本数据分布特征。故采用Probit回归方法分析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并利用边际效应测度超时劳动的真实影响力,实证方程如下:

$$Y_{it} = \Phi(\alpha W_{it} + \beta X_{it} + \gamma Z_{it} + \lambda K_{it} + \zeta Q_{it} + \gamma_4 \chi_t + \gamma_5 \chi_{pro}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因变量 Y_{it} 为第 t 年 i 居民的结婚和生育行为, W_{it} 为第 t 年 i 居民的超时劳动, α 、 β 、 γ 、 λ 、 ζ 分别为自变量超时劳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和区域特征的系数。时间固定效应 χ_t 为控制年份相关的变量,区域固定效应 χ_{pro} 用来控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征, ϵ_{it} 为随机误差项。由理论假设可知,超时劳动虽提高了工资收入,但工作疲劳也降低了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进而影响居民婚育行为,故检验识别超时劳动对机制变量的因果关系:

$$M_{it} = \alpha_1 W_{it} + \beta X_{it} + \gamma Z_{it} + \lambda K_{it} + \zeta Q_{it} + \gamma_4 \chi_t + \gamma_5 \chi_{pro} + \epsilon_{it} \quad (2)$$

M_{it} 为工资收入、工作满意度、幸福感中介变量。为了增强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还检验机制变量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因果关系:

$$Y_{it} = \eta_2 M_{it} + \beta X_{it} + \gamma Z_{it} + \lambda K_{it} + \zeta Q_{it} + \gamma_4 \chi_t + \gamma_5 \chi_{pro} + \epsilon_{it} \quad (3)$$

(三)变量定义

因变量为婚育行为:青年人的当期结婚和生育行为。青年人的结婚现状为二值型变量,即将受访期内结婚的样本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超时劳动个体缺乏抵御流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物质基础,同时挤占婚恋时间,而物质和时间是婚姻稳定的重要因素,影响个体结婚的机会和行为,故超时劳动会影响个体的当期结婚行为。生育行为^①也为二值型变量,即受访期内有孩子的样本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婚育行为产生的生活压力,也会迫使个体被动接受超时劳动,因此选择当期婚育行为以降低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偏误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对多数普通劳动者而言,结婚和生育行为仍然绑定在一起,即符合结婚在前生育在后的行为秩序,还未普遍出现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主张的“恋爱—婚姻—生育”之间脱钩断裂的现象^②。因此,已婚样本的当期生育行为也进入研究范围内,分析超时劳动对已婚青年劳动者生育行为的影响。

自变量为超时劳动,包括超时劳动和工作时长2个变量。其中,工作时长为每月工作时间,以问卷中“主要工作的时长”为表征。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9年发布的《关于职工全年月平

① 相对而言,生育意愿易受到主观因素影响,一些短暂性外界状况以及生育成本等更为复杂的现实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落实。而生育行为是育龄群体在现有物质以及社会资本支持基础上对生育效益与成本衡量后的理性选择,综合了宏观生育水平和微观个体意愿等结果性信息。

② 汪永涛:《新家庭主义与当代青年婚育行为研究》,《思想战线》2024年第3期。

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扣除104天休息日和11天法定节假日,每月需要工作20.83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月累计加班不超过36小时,故每月正常工作时长应不超过202.64小时。而超时劳动也为二值型变量,将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02.64小时的样本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

机制变量为工资收入、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第一,工资收入采用税后工作总收入来衡量。税后工资收入与劳动收入直接关联,可以更精准地反映个体通过劳动获得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第二,工作满意度整理自受访者对题项“您对工作有多满意”的回答。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不仅破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还易使员工产生倦怠感,对工作内容、环境以及职业发展等产生负面评价,而职业成就感和满足感的缺失,会增加个体在工作与婚育上的抉择难度,进而降低个体对婚育的接受度和期待值^①。第三,幸福感整理自受访者对题项“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的回答,将回答大于5的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超长工作挤占了个体休闲和自我提升时间,容易导致个体身心疲惫,引发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②,而幸福感与婚育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控制变量包括影响青年婚育行为的主要系列变量,包括个体变量、家庭变量和社会变量三大类。考虑到中国青年劳动者正处于工作和物质累积的黄金期,超时劳动会挤占青年劳动者的私人活动时间,其面临的婚育压力由此增大。但这一压力会因个体特征而存在差异,且家庭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具有缓解作用,故控制变量优先从个体变量和家庭变量中选择。第一,个体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信任他人等影响婚育行为的变量^③。第二,家庭变量主要包括家庭人数、投资行为、是否有其他房产、家庭收入、人情礼支出等影响婚育行为的变量。第三,社会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地位、是否有医疗保险以及是否收到社会捐助等影响婚育行为的变量,其中有医疗保险的取值为1,否则为0。与此同时,为控制区域变量对实证结果的影响,还控制了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开放程度,而对外开放程度采用货物进出口总额来衡量。

三、超时劳动对青年婚育行为的影响分析

超时劳动虽能增加工资收入,但由此而出现的生活质量下降也会降低个体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因此采用Probit回归方法定量解析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方向和力度。

(一)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

超时劳动导致的身心疲惫将降低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为验证上述假设,采用Probit回归方法分析超时劳动对青年婚育行为的影响。控制了区域和时间固定效应,并使用个体聚类标准误,回归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1)超时劳动和工作时长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超时劳动显著减少了青年劳动者的结婚和生育行为,超时劳动虽能增加个体工资收入,但工作时间过长的负向作用也会导致个体婚育行为发生可能性的降低。(2)考虑到中国总体上非婚生育比例非常低^④,超时劳动对个体结婚行为影响也会叠加到生育行为,故也分析了超时劳动对已婚青年劳动者生育行为的影响。婚姻关系为生育提供了法律和社会认可基础,婚育行为关联性较强,故超时劳动对二者也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控制变量结果与已有研究和经验事实相一致,而且还通过固定区域和时间效应控制地区层面逐年变化的不可观察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

① 杨华磊、王嘉昊、肖文静:《养育子女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② 刘善仕、裴嘉良、葛淳棉等:《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理论探索与研究展望》,《管理世界》2022年第2期。

③ 周建军、任娟娟、鞠方:《住房分层对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④ 宋健、郑航:《非婚生育走向何处——比较视野下的婚育模式变迁》,《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表1 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影响的实证结果

	结婚行为		生育行为		已婚样本生育行为	
超时劳动	-0.160*** (0.025)		-0.233*** (0.020)		-0.253*** (0.022)	
工作时长		-0.089*** (0.013)		-0.148*** (0.010)		-0.148*** (0.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106	0.106	0.080	0.084	0.171	0.173
样本量	30244	30244	30262	30262	23075	23075

注:括号内为个体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下同。

婚育行为和超时劳动均为二值虚拟变量,回归模型为非线性模型,得到的系数估计值并非自变量的真实边际效应,故测算了自变量的边际效应,即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真实解释力。第一,从超时劳动来看,超时劳动每提高1单位,青年劳动者结婚可能性显著下降1.781%,生育可能性显著下降5.253%。从工作时长来看,工作时长每提高1单位,青年劳动者结婚可能性显著下降0.991%,生育可能性显著下降3.320%。第二,超时劳动边际效应相对更大,其对青年婚育行为边际效应约为工作时长边际效应的1.8倍,中国劳动法本就考虑了企业合理加班需求,在此基础上的过度加班对青年婚育行为负向影响较大,因此应重视“996”“007”工作制下恶性超时劳动对个体婚育行为的负向影响。第三,随着工作时长逐渐增加,其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负向边际作用也越来越小。这也与超时劳动对生育行为的边际效应约是对结婚行为边际效应的3倍一致,即当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加班时长后,加班会对个体身心造成严重影响,这会对生育行为产生约束作用。尤其是相较于结婚而言,生育成本更高,而且超时劳动对个体结婚行为的影响会传递到生育行为,因而当超时劳动加剧个体在生育与自我实现间的两难矛盾时,个体生育抉择会更艰难。超时劳动有利于职位晋升和事业发展,可部分抵消缺乏时间谈恋爱结婚的不利影响,但超时劳动累积的影响,会降低青年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意愿,对青年生育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

(二)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机制

加班能增加劳动者收入,但超长劳动时间也将增加劳动者疲惫感,使劳动者的职业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下降。换言之,超时劳动可通过工资收入、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三种机制影响青年劳动者的婚育行为。工资收入增加了青年婚育行为的物质基础,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能增强青年对婚育行为的期待和愿景,即机制变量与因变量间的理论因果关系较为直观,故本文主要识别超时劳动对机制变量的因果关系。表2汇报了超时劳动影响机制回归结果,超时劳动和工作时长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结合表1基准回归结果来看,超时劳动显著增加了青年劳动者工资收入,并降低了其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故工资收入、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是超时劳动影响青年婚育行为的三个影响机制,综合降低了青年劳动者婚育可能性,研究假设2、假设3和假设4得到了验证。

表2 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影响机制的实证结果

	工资收入机制		工作满意度机制		幸福感机制	
超时劳动	0.117*** (0.012)		-0.143*** (0.018)		-0.097*** (0.021)	

续表 2

	工资收入机制		工作满意度机制		幸福感机制	
工作时长		0.099*** (0.005)		-0.049*** (0.009)		-0.039*** (0.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或Pseudo R ²	0.317	0.323	0.090	0.089	0.070	0.070
样本量	30262	30262	27764	27764	24568	24568

为了增加中介效应分析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了机制变量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从表3回归结果可知,除工作满意度对结婚行为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外,机制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工资收入和幸福感可增加青年劳动者婚育可能性,工作满意度可增加青年劳动者生育可能性。结合表1和表2的实证结果来看,超时劳动的中介效应存在,即超时劳动增加了个体工资收入进而提高青年的婚育可能性,而超时劳动降低了个体工作满意度进而降低了青年的生育可能性,也降低了个体幸福感进而降低了青年的婚育可能性。

表 3 机制变量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结婚行为			生育行为		
工资收入	0.069*** (0.016)			0.029*** (0.011)		
工作满意度		0.013 (0.027)			0.049** (0.021)	
幸福感			0.181*** (0.041)			0.060** (0.02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105	0.107	0.118	0.075	0.076	0.079
样本量	30244	27746	24554	30262	27764	24568

(三)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影响的异质性

由于婚育行为还会受到时间和个体因素约束,而且不同群体对超时劳动感知存在差异,因此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故将从最佳生育年龄、数字依赖和城乡区域方面探讨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影响的异质性。

首先,无论是超时劳动还是工作时长,均对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的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大。从优生优育视角来看,将16—35岁归为最佳育龄人群。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的青年劳动者,虽处于适婚适育阶段,但这一阶段同样也是个体事业发展黄金期,更容易出现超时劳动的情况,而超时劳动带来的身心疲劳和生活压力,会显著放大个体面临的事业与家庭两难困境。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的青年群体是中国解决人口少子化、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所在,对该群体超时劳动的关注与治理,政策效果也相对更大。

表 4 最佳生育年龄异质性分析的实证结果

	是				否			
	结婚行为		生育行为		结婚行为		生育行为	
超时劳动	-0.173*** (0.027)		-0.253*** (0.022)		0.061 (0.096)		-0.156*** (0.046)	
工作时长		-0.093*** (0.013)		-0.159*** (0.011)		-0.015 (0.045)		-0.113*** (0.0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048	0.049	0.072	0.076	0.085	0.084	0.122	0.125
样本量	20526	20526	20539	20539	8737	8737	9701	9701

其次,无论是超时劳动还是工作时长,均对数字技术依赖强的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负向影响更大。互联网是数字科技的核心载体和外在依托,驱动了数字科技的发展,而计算机又是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基础设备,故借鉴赵放和蒋国梁的做法^①,采用问卷中“工作是否使用计算机”题项,来衡量个体对数字技术的依赖强度,分析结果见表 5。对数字技术依赖强的工作,通常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专业性,需要劳动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即对数字技术依赖强的青年劳动者的工作强度与面临的工作压力都相对较大,导致他们在工作与家庭间更难以平衡。而且对数字技术依赖强的工作,对劳动者的数字素养要求更高,也是目前中国大力提倡的高质量就业类型^②,故需监督严重且无效无偿的超时劳动,建构良好就业环境。

表 5 数字技术依赖异质性分析的实证结果

	强				弱			
	结婚行为		生育行为		结婚行为		生育行为	
超时劳动	-0.169*** (0.036)		-0.243*** (0.030)		-0.131*** (0.048)		-0.187*** (0.035)	
工作时长		-0.111*** (0.020)		-0.164*** (0.017)		-0.083*** (0.023)		-0.119*** (0.0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075	0.076	0.068	0.070	0.125	0.126	0.090	0.093
样本量	12382	12382	12395	12395	9443	9443	9494	9494

最后,无论是超时劳动还是工作时长,均对农村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负向影响更大(见表 6)。农村居民的教育和文化资源相对匮乏,工作岗位稳定性和福利保障相对较差。在当前中国正大力推进

① 赵放、蒋国梁:《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学刊》2023 年第 2 期。
② 王海军、葛晨:《数字素养促进了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吗?》,《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4 年第 3 期。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形势下,人力资本储备层面的差距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满足技术变革新阶段对劳动力的要求,因此数字技术创造性破坏效应对农村居民的冲击更剧烈^①,农村青年将面临更加内卷化的工作环境。而且农村青年收入水平相对更低,更需要通过加班获得更多劳动收入,来应对结婚所需的彩礼、建房以及养育孩子带来的经济支出压力。

表 6 城乡异质性分析的实证结果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结婚行为		生育行为		结婚行为		生育行为	
超时劳动	-0.089** (0.043)		-0.204*** (0.034)		-0.209*** (0.033)		-0.235*** (0.024)	
工作时长		-0.047** (0.023)		-0.135*** (0.018)		-0.113*** (0.016)		-0.153*** (0.0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107	0.107	0.101	0.103	0.118	0.120	0.077	0.081
样本量	10371	10371	10351	10351	19282	19282	19303	19303

(四)进一步研究

婚育并非个体行为,家庭成员的共同作用可对其形成一定的支持,如隔代照料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青年人面临的职场育儿冲突,因此需要考虑家庭成员总的超时劳动对个体婚育行为的影响。而且个体工作时长的变化还会受到诸如经济需求、成员分工等家庭内部因素影响。家庭平均工作时间较长一方面意味着家庭内部的代际照料等帮扶能力较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家庭总收入可能会因工作时间较长而相对较高。考虑到家庭活动的内部联动性,故计算有工作的家庭成员的平均工作时间,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家庭平均超时劳动,研究其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一人户家庭平均劳动时间与个体劳动时间无差别,故将一人户家庭从样本中剔除^②。从实证结果来看,无论是超时劳动还是工作时长,均对当期青年婚育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通过计算家庭平均超时劳动后实证结果仍然稳健。

(五)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个体固定效应通过控制个体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能够捕获个体间异质性,减少因遗漏个体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偏误影响,增加实证结果说服力,故将个体固定效应纳入回归方程,分析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7。核心自变量系数仍为负,即超时劳动显著降低了青年劳动者的当期婚育行为,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后实证结果仍未发生改变。

表 7 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结婚行为		生育行为		已婚样本生育行为	
超时劳动	-0.015*** (0.005)		-0.054*** (0.006)		-0.058*** (0.008)	

① 钞小静:《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新变化及破解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② 篇幅限制,家庭平均超时劳动的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备案。

续表 7

	结婚行为		生育行为		已婚样本生育行为	
工作时长		-0.011*** (0.002)		-0.036*** (0.003)		-0.038*** (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361	0.362	0.466	0.468	0.486	0.487
样本量	27557	27557	27557	27557	20876	20876

为降低内生性的偏误影响,以同职业、同居住地和同职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平均值,分别构建工作时长及对应的超时劳动的工具变量,检验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作用。工作环境变化会增加个体工作流动频率,而技能专业性和知识经验累积均增加了跨职业流动的难度和障碍,故超时劳动存在职业同群效应。同群效应意味着同职业劳动者的劳动时长具有关联性,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要求。同时,同职业的其他青年劳动者超时劳动对个体婚育行为影响较弱,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考虑到不同居住地间的工作流动存在较大成本,同居住地的青年劳动者的劳动时长也具有关联性,故也将同居住地和同职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平均值以及对应的超时劳动作为工具变量。一阶段F值均大于临界值10,AR的P值小于0.05,在5%水平上显著,工具变量能较好地解释内生变量。IV-Probit回归结果显示,超时工作和工作时长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说明在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偏误影响后,超时劳动和工作时长依然降低了青年劳动者的婚育行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体生育行为已变得较为谨慎和理性,尤其是多重生育成本将降低序列相关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偏误影响,故将超时劳动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来控制不存在序列相关的不可观察因素的偏误影响,以缓解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一阶段F值均大于临界值10,AR的P值均小于0.01,在1%水平上显著,工具变量能较好地解释内生变量。IV-Probit回归结果显示,超时劳动和工作时长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工具变量均与超时劳动和工作时长正相关,故在采用超时劳动滞后一期构建工具变量,以控制内生性的偏误影响后,超时劳动依然显著降低了青年劳动者生育行为。

控制变量由个体变量、家庭变量、社会变量和区域变量构成,控制变量不仅数量多,还易出现变量共线性问题。而Lasso回归方法可以通过构造惩罚函数来解决共线性问题,同时还可以进行特征筛选,寻找更有价值的控制变量。泊松分布适合于描述单位空间内随机事件发生的次数,即样本量内婚育行为发生的次数,故采用Lasso回归和泊松回归方法做稳健性检验。核心自变量系数仍显著为负,说明采用Lasso回归和泊松回归方法分别控制变量共线性和过度离散问题后的实证结果仍未发生改变,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四、总结与讨论

近些年,中国结婚率持续下降、离婚率持续上升,单身和独居成年人数不断增加,青年劳动者逐渐追求不婚不育的低欲望生活。结婚和生育对青年劳动者来讲,不仅仅是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也意味着两个人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超时劳动将使得个体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降低婚育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利用Probit回归方法分析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显示:(1)超时劳动显著降低了青年劳动者结婚和生育行为的发生率,且对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大,

经系列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稳健。(2)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结婚和生育行为的边际效应分别为 -1.781% 和 -5.253% ,并且随着工作时长逐渐增加,工作时长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负向边际效用也越来越小。(3)超时劳动能通过工资收入和幸福感两种机制综合降低青年劳动者的结婚行为的发生率,通过工资收入、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三种机制综合降低青年劳动者的生育行为的发生率。(4)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对数字技术依赖性强、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的农村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负向影响相对更大。基于研究发现,需要从规范超时劳动、改善机制效应和关注异质性群体等方面不断完善相关治理。

第一,建构规范友好的职业环境,减少无效无薪超时劳动。研究发现,超时劳动显著降低了青年劳动者婚育行为的发生率,其对生育行为负向影响更大,需要构建依托和谐劳动关系的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建构公平就业环境、和谐劳动关系的就业工作体系,需要维护劳动者就业权益,并监督市场与社会中严重且无效的超时劳动,采取必要措施鼓励企业坚持以劳动者为本,革新管理方式,完善绩效考核机制,设定清晰的加班工资豁免的内容与标准。克服并纠正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提高工作效率,重视劳动质量,营造全社会范围内弱化无效加班的氛围。加大对严重超时工作的监管和规范力度,依法依规实施全面精细化监管并惩处存在严重超时工作的企业的举措,用人单位工时和休息休假落实情况、特殊工时制度实施情况、加班及与工会劳动者协商情况等都被纳入监管范围,减少无效和无薪加班,进一步减轻青年劳动者工作负担。同时,媒体关注、公众监督和企业责任信息披露都有助于多渠道改善超时劳动问题,增强劳动者知权维权意识,完善监督机制。总之,从长远来看,要保障青年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流动性,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工作议价能力,跳出超时劳动依赖陷阱。

第二,改善超时劳动与收入倒挂关系,兼顾工作弹性与安全双重目标。研究发现,超时劳动通过增加工资收入提高了青年结婚可能性,同时降低了工作满意度或幸福感进而降低年轻人婚育可能性。当下青年背负多种生活成本与压力,选择超时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收入以满足婚育和家庭需求,因此,需要积极推进加班费用和工资报酬合理化。例如,相关法规应当增加加班时间的弹性化规定,完善超时工作的补偿机制。中长期来看,要改善青年劳动者对超时劳动增加收入的路径依赖,鼓励技术发展以引导产业升级、优化经济增长方式,夯实经济社会基础,拓展加班与强制工时的灵活性,完善补偿休息程序和制度,确保劳动者年加班总量的灵活规制。通过绩效奖金、表彰制度和开放沟通渠道等方式,认可员工的成就进而提高青年劳动者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提供舒适的办公设施和创造和谐的团队氛围,关注劳动者心理健康,降低工作压力,通过透明化管理增强员工信任和热情等。另外,需要体系化提升青年劳动者的幸福感,尤其是保障女性生育权益使其平衡工作家庭关系,多维重视家庭照料的基础地位。总之,平衡超时劳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既要满足青年劳动者提升收入的需求,也要规避超时劳动对婚育的负面影响。

第三,引导规范新兴领域劳动治理,建构共建共享劳动体制。研究发现,超时劳动对数字技术依赖强、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和农村青年劳动者的婚育行为影响更大,因此需要关注异质性影响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增强技术加持作用,重视劳动者技能和教育培训,改善数字经济劳动条件,优化数据要素资源配置等。并且不能忽视数字劳动者的工作境况,需要探索新型劳动关系,警惕劳动者的低端锁定,畅通职业流动渠道,提高其就业质量。同时,需要引导和协商督促农村居民的超时劳动和福利保障问题,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防止不合理或无偿加班,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等。从长远来看,也要在农村居民的经济补贴、文化重构、服务支撑、就业能力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对于需要通过职业发展增加自我价值和降低生活压力的最佳生育年龄的劳动者,可以加大医保支出,推行基本生育免费,建构多形式托育、养育和教育服务,探索生育成本共担机制,提供弹性工作制等。总之,数字技术依赖强、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的青年劳动者更易受到超时劳动的影响,而如何支持这些未来婚育行为的主力军,在新的劳动技术环境中应对挑战,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and Mechanisms of Overtime Labor on Youth Marriage and Fertility Behavior

Xiao Han Ge We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P.R.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low fertility rates is crucial to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Reproductive governance that enables young workers to share in developmental achievements holds significant long-term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le economic growth and management are progressively transitioning from a time-intensive approac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vertime labor continues to exert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young workers, particularly as the number of single and solo-living youth increases annually, leading to a low-desire lifestyle with reduced marriage and fertility behaviors. This study utilizes micro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base, employing a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s and mechanisms of overtime labor on young workers' marriage and fertility behaviors, thereby enhancing the research's real-world explanatory power and practical valu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vertime labor significantly diminishes young workers' marriage and fertility behaviors, with a more pronounced negative effect on fertility.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endogeneity sensitivity tests. Overtime labor comprehensively reduces marriage behavior through wage income and happiness mechanisms, and fertility behavior through wage income, job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mechanisms. Moreover, the impact of overtime labor on youth marriage and fertility behaviors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with a relatively greater negative influence on rural youth workers who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within their optimal childbearing age. The paper's marginal contribution lies in recognizing young workers as the primary subject group for overtime labor and marriage-fertility behaviors. Given the prevalent discrepancy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actions among Chinese youth, the impact of overtime labor is more immediate and practical. The study offer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n the complex mechanisms of wage income, job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closely reflecting China's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narrative, thereby increasing the sustain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dvances toward higher quality, young people increasingly prioritize spiritual needs and seek work that promote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values. The pursuit of workplace satisfaction and achievement further enhances the value of these mechanism effects. The research enriches the discussion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overtime labor. Heterogeneity exists in terms of optimal age at childbearing, numerical dependence, and rural-urban heterogeneity due to the temporal and individual constraints of marriage and fertility behaviors, and the varying perceptions of overtime labor across different group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advocates for improving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time labor and income, balancing work flexibility and safety, regulating labor governance in emerging fields and vulnerable groups, and constructing supportive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shared labor systems.

Keywords: Overtime labor;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behaviors; Wage; Job satisfaction; Happiness

[责任编辑:王苏苏]